

罗兴萍 著

英雄·凡人·文学史

主编：王光东、吴义勤

新世纪批评文丛

—— 论文学视野下的英雄与凡人



上海大学出版社

新世纪批评文丛

主编：王光东 吴义勤

英雄·凡人·文学史

试论文学视野下的英雄与凡人

英雄的叙事

凡人的信仰

文学散论

上海文学四十年大事记

上海大学出版社

·上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英雄·凡人·文学史/罗兴萍著. —上海: 上海大学出版社, 2009. 8

(新世纪批评文丛/王光东, 吴义勤主编)

ISBN 978-7-81118-485-3

I. 英… II. 罗… III. ①现代文学-文学研究-中国-文集②当代文学-文学研究-中国-文集 IV. I206.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23664 号

责任编辑: 焦贵平

英雄·凡人·文学史

罗兴萍 著

上海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市上大路 99 号 邮政编码: 200444)

(<http://www.shangdapress.com> 发行热线 66135110)

出版人: 姚铁军

*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排版

上海第二教育学院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90 × 1240 1/32 印张 7.25 字数 201 000

2009 年 8 月第 1 版 200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100

ISBN 978-7-81118-485-3/I·101 定价: 24.50 元



序

上海大学出版社将要出版罗兴萍的论文集《英雄·凡人·文学史》，她来信希望我写几句话作为序。我匆匆在电脑里浏览一遍书稿，其中好几篇论文都是以前发表在刊物时读过的，有的还刊发在我主持的栏目里，所以要我对这本书稿说几句话并不困难。

首先是《〈黑暗传〉与〈圣天门口〉的互文性研究》一文，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这是一篇用民俗文化的视角来研究刘醒龙的长篇小说《圣天门口》的论文。记得是2007年的年初，复旦中文系举办《圣天门口》的研讨会，当时发言的人很多，但给我留下比较深刻印象的，就是还在上海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罗兴萍的发言。虽然她的发言不长，又因为坐在后排，会上乱哄哄的好像也不曾引起与会者的注意，但我在当时的感觉是，她非常认真地读过《圣天门口》，不但读完，而且作了认真的文本分析；她运用了民间文艺方面的知识将《圣天门口》与民间史诗《黑暗传》作了对照研读，显然是有新意的。会议结束后，我特意把罗兴萍的发言稿取来看，那是一份还未成熟的初稿，但里面已经画了详细的对照表。我建议她作进一步

的修改,可以作为会议的发言在《文艺争鸣》杂志上发表。我毫不怀疑这是一篇对《圣天门口》,也是对当代文学中的民间问题的突破性研究文章。后来可能是因为作者修改的时间过长,未能及时赶上那一期杂志的发稿。我获知后不觉窃喜,便主动取来放在我在《当代作家评论》杂志上主持的《文本细读与比较研究》栏目里刊发,因为这篇文章正符合我所倡导的文本细读。

我在一篇读书笔记里论述过《圣天门口》的意义。我以为,以家族史的斗争兴衰来影射中国现代史的多重理解,是近二十年来中国长篇小说的一大特征。《白鹿原》首创民间证史的模式,以后这类题材及其创作方法基本上是沿着这个传统而来。《圣天门口》要比《白鹿原》多出一倍的篇幅,这么重山复水地写来,究竟要想表达什么东西?《圣天门口》在《白鹿原》的基础上究竟突破了什么?有一个很明显的区别是,《圣天门口》所揭示的家族纷争以及兴衰交替,不仅仅是一种政治权力争夺更替的图解,而且是对一种暴力哲学的反思。《白鹿原》以民间叙事解释了中国政治斗争史的多元意义,陈忠实想说明,在政治伦理之上,还有一个更为稳定的民间伦理,其背后有民族文化传统为支撑力量,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即所谓民间自有公道。而《圣天门口》进一步超越了民间文化与现实政治的二元对立,作家努力揭示的是:在政治伦理之上,不仅仅有民间伦理的存在,而且在更高的层面上还有精神伦理笼罩其上,那就是非暴力。它超越了政治暴力,也超越了民间伦理,直接从精神层面来展开对话。我们展读小说所描写的天门镇故事,其三重象征的意象非常清楚:杭九枫与马鸽子之间的生死拼杀,本来属政治伦理,但由于段家姊妹分别嫁给了杭与马,连接起一个更为巩固的民间伦理关系,以致两家在冲突中有了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可以共认一个儿子,并视对方血脉如同己出。同时,包括天门镇的雪家与镇上居民的关系,都有民间伦理制约其后。但,在这双重伦理纠葛之上,凛然耸立着非暴力的精神坐标,那就是从武汉来到天门镇的梅外婆。梅外婆不是土生土长的天门人,而是一个接受过西洋科学教育、“信外国的神唱外国的歌”的新式知识分子,而且,梅外婆的丈夫梅外公是

辛亥革命元老，他从实际的革命教训中意识到暴力的可怕，挺身而出反对之，最后死于非命。梅外婆是为了实践丈夫的政治理想来到天门镇，最终成为天门镇的精神领袖。因此，梅外婆所象征的，不是民间本有，而是一种新的外来的精神力量。

要注意到这一重要特征，就必须注意到《圣天门口》的循环型叙事结构。罗兴萍所做的研究，就是将《黑暗传》文本与小说的整体叙事文本就历史内容做了细致地对照，把小说的循环型叙事解释得合情合理。这部小说有鲜明的民间叙事结构，它以流传于神农架地区的民间唱史为文本中的文本，从盘古开天地的神话起源，一直唱到满清结束、民国建立。而小说正文的叙事部分，则是从民国初年写起，一直写到“文革”，构成了历史与现实的衔接与循环，整个历史说唱都是围绕了征战杀伐，处处影射了现代社会的政治暴力。正如小说里一个人物所说：“说书说了这么多年，我才明白，一代代汉民族的兴衰，只不过是將一段段的历史，换上不同的衣衫一次次地重演。”^①但是这种历史循环论只是小说里的人物对历史的一种领悟，也可能说明作家自己的一部分思想，但两者并不能完全等同起来。这是认识这部小说的关键所在。

很多论者都觉得小说叙事里插入《黑暗传》是一个累赘，完全看不到这套文本是小说构思不可或缺的。因为就小说结构而言，作家在《黑暗传》文本与天门镇史的循环周期里加入了新的因素，那就是20世纪的中国已经成为世界格局内的一部分，外来的因素为中国现代史提供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新的“质”。这个“新质”就体现在作家精心塑造的梅外婆身上。小说里所有的历史说唱部分都与现实叙事处处有对应，但没有一条与梅外婆的故事直接有关。按理说，梅外婆来到天门镇、梅外婆被日本军队残忍地强暴，梅外婆的死，都是小说的高潮部分，可是文本里没有一处是用说唱来应和渲染的。而且，我还注意到，小说开始部分，最先出现的说唱文本并不是《黑暗传》的创世说唱，而是一段赞美诗，同样，梅外婆死

^① 刘醒龙《圣天门口》（下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5月版，第1012页。

的时候,也是由赞美诗取代了传统的祭奠仪式。刘醒龙对于梅外婆的信仰宗教及其文化新质在小说内外都不置一辞。可见他并不是需要在梅外婆形象里凸出一种新的说教,他所想做的,仅仅是探讨另外一种外在精神融汇到民族文化中的可能性。

这另外一种精神,在中国究竟是否可能?作家没有正面回答,人类历史至今仍然是强权主导,非暴力作为一种弱势群体的理想,至少在今天并没有成为思想界的主流。但是早期的基督徒却实行过,圣雄甘地实行过,美国黑人领袖马丁·路德·金也曾经这样引导过黑人的斗争。中国古代也曾有过以德报怨的圣训,但在现代世界上,这样的声音是极为微弱的,几乎是不可信赖的。因此小说必须如此繁琐地写天门镇的一场场杀戮,写梅外婆以及雪柠一家要经受如此多的残酷摧残,也相应地写出天门镇人在梅外婆的精神关照下所发生的艰难的人格转变。这是最难得的一笔,从雪柠起,有常娘娘、常天亮、小岛和子、董重里、阿彩、紫玉、段三国、一镇、雪蓝、雪荭……构成了一道庞杂而汹涌的精神洪流。作家不通过如此繁复的鸿篇巨著不足以表达精神洪流形成的艰巨,这不是宗教布道,而是靠精神的潜移默化来唤起人类遗忘已久的良知。

罗兴萍这篇论文正是回答了这个良知的起源问题。在文本分析中,她完全用上了民间文学研究成果。我注意到她特别地分析了小说在第一章提出的发问:谁是历史上最早被杀的人?她否定了小说里人物杭天枫所说的,共工是历史上第一个被杀的人,而是从《黑暗传》里找出了来自非正史里的人物浪荡子。这是很有意义的命题,如果我们进一步将浪荡子形象与《圣经》里的亚当夏娃形象作系统的比较研究的话,那也许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我们将有可能在汉民族民间史诗里发现精神史的新因素,而在一个更高的文化层面上来讨论东西方民族文化的沟通。

还有一篇也给我以深刻印象的论文是《当代文学(1949—1976)民间英雄叙事的潜在建构》。这是罗兴萍博士论文中的一部分。她的博士论文总题目为《民间英雄叙事与当代小说》,探讨了中国古代小说中的民间英雄叙事如何被当代小说创作所吸取并产生影响。本书的第一辑所收录

的几篇论文,正是她的博士论文中的部分章节改写的。自“民间”的理论在当代文学领域运用后,不少学者在论述这一问题时都把当代作家(主要指1949—1976年期间的作家)吸收并发扬民间文艺的形式和营养作为论述当然的前提。这当然是有一定道理的,但也似过于笼统。罗兴萍的文章却是要纠正这种观点,她想说明:在这个历史阶段,文学英雄叙事主要是为了加强新政权成立之初的国家意识形态建构,所以,当代文学的英雄主题来自主流意识形态的建构,与民间英雄叙事并非一回事,而且后者一直受到前者的压抑与限制,仅仅被允许在形式方面发挥作用。民间英雄叙事之所以能够存在并产生较大的影响,主要是来源于主流作家本身的教育背景和知识结构,是在潜移默化中发生作用的。这个观点,对于理解民间文化形态在创作上的实际功能,是很重要的突破。

罗兴萍:《民间英雄叙事的建构与解构——以当代文学英雄叙事为中心》,《文学评论》2004年第4期。

出作者有开阔的视野；但毋庸讳言，也有些论文比较一般。我很了解罗兴萍的性格，她的聪敏和慵懒总是交替的，所以我读此书稿的感觉是，论文都接触到很有意义、有待深入讨论下去的话题，但似乎是点到为止，没有进一步地开掘。我想在这篇序里掺入一点激励，激励罗兴萍能够再接再厉，在学术上更上一层楼。是为序。

陈思和

2009年5月8日

于香港岭南校园

目 录

序

第一辑 英雄的叙事

试论本土英雄概念的生成和流变 2

试论民间英雄叙事传统的构成 15

当代文学(1949—1976)民间英雄叙事的潜在

建构 35

“文革”后文学史上民间英雄叙事的显性建构 50

试论当代英雄叙事小说中的英雄成长模式 55

试论当代英雄叙事小说中的英雄配置模式 63

《黑暗传》与《圣天门口》的互文性 73

传统评书对当代英雄叙事的影响 88

第二辑 凡人的信仰 199

试论周作人的民间文化研究 100

周作人民俗学思想探源 111

周作人与儿童文学 120

周作人对民间歌谣研究的贡献 130

《知堂夜话》前言 140

第三辑 文学散论 145

文学史分期与文学观念的演变 146

当代小说中的民间说唱艺术因素 152

上海文学的未来扫描 159

鲁迅精神在当代文学中的复活 164

试论莫言在《酒国》中对鲁迅精神的继承 171

梁实秋：在雅舍中品味世态人情 178

林语堂：在东西方文化之间寻找闲适与幽默 189

附录 195

上海文学界四十五年大事记 196

第一辑

英雄的叙事

试论本土英雄概念的生成和流变

一、英雄概念的生成

本文所讨论的“本土英雄概念”，是为了区别学术界根据西方英雄史诗的传统来界定和论证的“英雄”概念，从中国古代小说里产生的“英雄”概念及其在文学演变中形成的文学典型的传统，这种本土英雄概念和传统究竟在多大的程度上对中国当代文学产生影响，将成为本文所要关注的重点。

在中国历史上，英雄的概念出现较晚。据说滥觞于汉代，生成于三国，广泛运用于魏晋。西汉经学家韩婴在《韩诗外传》卷五中写到：“夫鸟兽鱼犹知相假，而况万乘之主乎？而独不知假此天下英雄俊士与之伍，则岂不病哉！”^①他说：鸟兽鱼都知道互相协助，而天子却偏偏不知道借助天下的英雄和有才干的人，与他们交朋友，这难道不是缺点吗？这里“英雄”与“俊士”并用，俊士即“有才干的人”，“杰出人物”的意思。就目前所见的资料，这是英雄一词第一次在文献中出现。东汉的史学家班彪^②作《王命论》，阐释他的君权神授思想，在论到汉高祖刘邦成帝业的原因时

^① 晨风、刘永平编译：《韩诗外传选译》，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年3月版，第251页。

^② 班彪：公元3—54年，东汉史学家。字叔皮，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东北）人，著《史记后传》等。

说：“英雄陈力，群策毕举，此高祖之大略所以成帝业也。”这里的“英雄”，解释为“识见、才能或作为非凡的人。”也可以解释为“杰出人物”，不过与《韩诗外传》中的“英雄”相比，其意义要稍微宽泛一些，但后来“英雄”概念所包含的主要意思都已经有了。因此，学术界一般认为，汉代是英雄概念的滥觞期。

汉末三国时期出现了专门论述英雄的文章，一是王粲《英雄记》^①、二是刘劭的《人物志·英雄》。^② 王粲《英雄记》是一本记录三国时期英雄人物主要事迹的书，已散佚。目前所能见到较全的辑录本，是俞绍初辑校的《建安七子集》附录中的《英雄记》。^③ 主要收入曹操、袁绍、刘备等 54 人的事迹，每篇长短不一，详略差别很大，较长的如吕布条，约两千四百多字，而短的如袁术条只有十三个字。所录人物的范围很宽泛，对人物也没有评价，都较为客观的记录当事人的家世、活动等。尤为突出的是，不只记录人物的成功，也记录人物的失败，如刘备条就记录刘备两次打败仗，狼狈逃走的事，而周瑜条则记了他火烧赤壁的伟业。也就是说，他不以成败论英雄。就目前残存的《英雄记》片断来看，王粲的英雄概念非常宽泛，大凡在汉末三国时，较为有能力，有智慧、才能和勇气出众的人都可入选，不以家世、成败和善恶论英雄。

刘劭的《人物志》则是三国时一本专门论述封建制度如何选拔人才，并开启了魏晋士大夫品鉴人物清淡风气的专书。他根据人物的性情、气质、才识的不同，把人才分为不同的类型，并对每种类型详加论析，其中专章论述到“英雄”。首先，他给“英雄”下了定义：“夫草之精秀者为英，兽之特群者为雄。故人之文武茂异，取名于此。”他认为，“文”“武”皆备，且文武才能都出众的人，才能称为英雄。换言之，英雄是聪明才智和胆力勇气

① 王粲：公元 177—217 年，汉末文学家，字仲宣，山阳高平人，“建安七子”之一，以《登楼赋》著名。原有集，已散佚。

② 刘劭：大约生于公元 186—245 年之间，三国魏哲学家。字孔才，广平郡鄆人，曾官至尚书郎、散骑侍郎，赐爵关内侯。著有《皇览》《新律》《人物志》等。

③ 俞绍初辑校：《建安七子集》，中华书局，1989 年 7 月版。

都皆备并超群的人。其次,他以英雄作为一种标准,并根据人才气质中具有的“英”和“雄”两种素质分量的不同而把人才分为三类:即英才、雄才和英雄。他认为:一个人气质中“英”的成分多,而“雄”的成分少,可以为相,反之,则可以为将。“必聪能谋始,明能见机(这两项为英),胆能决之(这一项为雄),然后可以为英。张良是也。气力过人,勇能行之(这两项为雄),智足断事(这一项为英),乃可以为雄,韩信是也。……故英可以为相,雄可以为将。”那么,什么样的人才刘劭心目中的英雄呢?“若一人之身兼有英雄,则能长世,高祖、项羽是也。”“故一人之身兼有英雄,乃能役英与雄,故能成大业也。”他只把“聪明才智”和“胆力勇气”兼具,并且都特别突出的人才称为英雄,如果他们上述两方面的才能有一方面稍微弱一些,他则把他们单独的归为“英”或者“雄”。英雄是可以驾驭指挥“英”或者“雄”,能成“大业”的人。实际上,他这里的英雄是指创业的帝王。总之,刘劭认为只有那些聪明智慧胆识勇气兼备的创业帝王,才能成为英雄。与王粲的英雄概念相比,他的英雄的范围要窄得多,但共同的是,他们都认为个人智慧、才能和勇气的出众是英雄的必备条件。若与《韩诗外传》和《王命论》中强调英雄的“识见、才能作为非凡”来看,还是一脉相承的。

从王粲和刘劭的论述看,“英雄”的含义是:1. 是一种评价人才的标准。2. 泛指一切才能、识见、勇气过人的人。3. 指文武双全的创业帝王。因此,英雄一词内涵基本确定,我们可以说英雄概念生成于三国时期。^①

那么,英雄概念为什么会生成于三国时期呢?原因有三,一是当时混乱的社会状况。汉末外戚和宦官专权,王权旁落,政治黑暗,造成社会的大混乱。各路英雄豪杰纷纷乘机建立自己的武装。在汉末,一些豪门大族都有自己的庄园,私人武装,以及大量依附他们的农民,构成强大的割据力量,甚至朝廷的地方官也纷纷拥兵自重。这种武装割据使原来的社

^① 刘志伟在《英雄文化与魏晋文学》(兰州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中认为英雄生成于汉末三国时代。我基本同意他的观点,并有所借鉴。

会秩序遭到破坏,而新的秩序还没有建立起来,秩序的真空为各种各样的英雄提供了争夺天下的机会,所以群雄并起,英雄辈出。英雄概念的生成只是现实状况的一个反映。

二是当时的用人制度。在汉末时就实行推荐用人制,这样品评人物的风气盛行。《后汉书》和《世说新语》中都记载了很多当时品评人物的事。如《后汉书·许劭传》记“曹操微时,常卑辞厚礼,求为己目。劭鄙其人而不肯对。操乃伺隙胁劭,劭不得已,曰:‘君清平之奸贼,乱世之英雄。’操大悦而去。”许劭是东汉末年品评人物的名士,曹操为了得到许劭的评价,甚至不惜动用武力,可见曹操十分重视许劭的评价,也可见出品评人物风气之盛。曹操当政以后,提倡“唯才是举”,到了延康元年(公元220年),曹丕采用吏部尚书陈群的建议,推选各郡有声望的人出任“中

产物。

以上三方面的原因,使得英雄概念必然的生成于这个时代。

到了晋代,英雄概念得到广泛使用。西晋史学家陈寿著的《三国志》,仅正文中“英雄”一词就出现了二十四次(裴松之注释中“英雄”一词的使用率也很高,不计在内)^①这样高的使用率,在以前的文献中是没有的,可以见出,英雄概念至少在晋时的文献中就开始广泛使用。而且在《三国志》中使用的英雄概念其含义包括刘劭提到的创业帝王英雄,《三国志·蜀志·先主传》中说:“是时曹公(曹操)从容谓先主曰:‘今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本初(袁绍)之徒,不足数也。’”这里的英雄显然是指创业帝王。但更多的时候,陈寿使用的英雄概念是第二个层面的,指聪明和胆识勇气过人的杰出人物。《三国志·吴志·张昭传》中,张昭劝谏孙权说:“夫为人君者,谓能驾御英雄,驱使群贤。”这里的“英雄”是指识见、才能作为非凡的杰出人才。而后一种用法,在《三国志》中更多。可见,晋时英雄概念被广泛使用,其内涵也比较清楚,既包含了刘劭定义的帝王英雄,也包括识见、才能作为非凡的杰出人物。

总之,从韩婴、班彪偶然用到“英雄”,到王粲、刘劭专门论述“英雄”,再到陈寿《三国志》中“英雄”的广泛运用,我们可以说,英雄概念滥觞于汉代,生成于三国,广泛应用于魏晋时期。

二、英雄概念的近代流变:以梁启超为例

英雄概念在近代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表现为英雄概念的内涵更加丰

① “英雄”在《三国志》中出现的具体数字是:魏书卷一:1个;卷六:3个;卷十三:1个;卷十四:3个;卷二十一:1个;卷二十四:1个。共计10个。蜀书中卷二:3个;卷五:3个;卷七:1个;卷十二:1个,共计8个。吴书中卷七:2个;卷九:2个;卷十三:1个;卷十七:1个。共计6个。(本数据根据北京国学时代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研制的《国学备要》全文检索光盘3·0版统计)